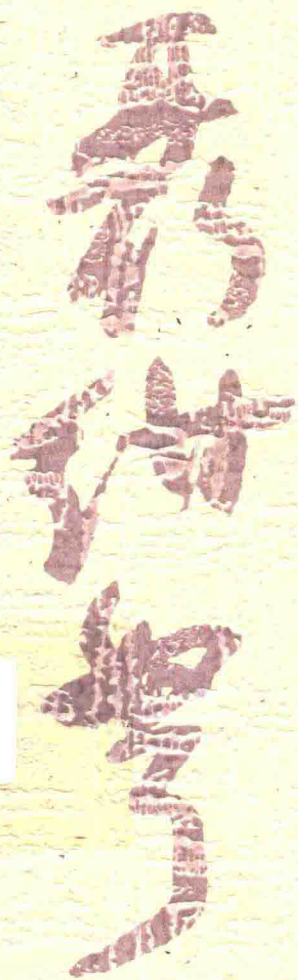


大家小集

聂绀弩集

下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 时弊篇

鬼谷先生立我前，乡人卖药免开言。  
文盲局长翻身穗，万里长城笑死钱。  
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  
何来一炬阿房火，烧到干妈义养乾。

——以拙集《杂文选》赠重禹系以一诗



## 《时弊篇》

本篇选录聂绀弩的杂文，也就是他“攻击时弊”的战斗业绩。篇头诗是《聂绀弩杂文集》198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他题赠舒芜的，其中列举的大概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一些篇目。1955年他为自己的《杂文选》写序时说：“鲁迅先生说过：攻击时弊的文章，应该随时弊一同消亡。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时弊’其实离消亡还是很远。处于那种‘时弊’如毛，或整体都是‘时弊’的社会中，有时几乎以为这社会是静止的，‘时弊’会永不消亡。现在，由于人民的解放，由于新中国的建立，‘时弊’又像根基很浅，一下子就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了。……那么，这些文章岂不也大可消亡了么？”但1977年至1978年之间他给舒芜的一封信中却说鲁迅“把时弊看得太脆弱了”，“旧物常打扮成新貌，在新时中复活起来”，并且因法官曾一再追究他写过的杂文而得意地“觉得自己真有点不凡之处。而这点不凡正是鲁师所无”。杂文是聂绀弩的主要成就，这里所选自然不够，甚至连代表性也谈不上，不过可以看到它们所攻击的“时弊”的确尚未消亡，因此这些子弹也还在飞。

## 关于知识分子

【1937年9月，聂绀弩的杂文集《关于知识分子》交由上海潮锋出版社付排，因国难遭损未印。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原载1935年10月15日《申报·自由谈》，署绀弩。其他各篇也都是抗战前上海文艺界的论战之作。后来上海潮锋出版社由卢亚平主编了一套“文学者丛刊”，聂绀弩的《关于知识分子》列为第四集，是根据1937年稿重排出版的。不过聂绀弩在1949年的“《血书》序”里说：“那本书，是抗战前写的，出版时（1948年）出版者未征求我的同意，我不能负责，那不算我的书。希望书店能自动毁版。”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聂绀弩这篇文章是针对某些知识分子的消极悲观情绪而发的。】

曹聚仁先生近来很看不起知识分子。记得他曾发过“百无一用是书生”之类的感慨，现在又在《五一霉菌补正》（十月八日《自由谈》）这篇文章上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靠不住，固然善于义愤填膺，同时也最会卖身投靠。梁启超推许杨度为最有血性的青年，而捧袁世凯上皇帝宝座的就是他；在上海做爱国运动领袖的赵欣伯，他现在在那儿做第一号汉奸；如黄远

生所自述，他自己做学生代表，自己先去投考所谓“专制”的南洋公学。知识分子的游离意识是最可怕的，把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当作纯洁的社会运动者来描写，那是最危险的……学生代表肯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真太少了！

知识分子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关系容易变动是周知的，不消说的。必须指出的是曹先生所说的“最不可靠”，主要的指先“义愤填膺”，后又“卖身投靠”，不“肯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即变坏的意思。当然，这种话有些好处。譬如说，可以教知识分子以外的人，在干什么运动的时候，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要盲目地相信知识分子，要时时监视督促，防止知识分子的退婴，变节及自己的被骗。同时也教知识分子自己警惕，加强决心，克服弱点。

然而曹先生把知识分子的变坏，好像说成宿命的，无法挽救的而且全称的了。如果知识分子的变坏是宿命的，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对无论什么运动都无需捧呈自己的热情，更无需克服自己的劣根性，因为反正无法挽救，倒不如各人知趣，早点“卖身投靠”的直截了当。如果只要是知识分子就靠不住，群众当然应该完全看轻他们的智多星，把这种“非我族类”的家伙早点从队伍里赶出去。这种解释，如可容许，曹先生的意见够危险了。

首先，曹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只是个抽象的名词。从这名词，除了知道是有知识的这一点，我们得不到别的无论什么。知识是怎样的知识呢？某知识分子，他的生活环境怎样呢？这些条件没有了解，就断定他靠不靠得住，未免太早计了。譬如郑孝胥前“满洲国”国务总理，岂不是个知识分

子么？林语堂“大师”，又岂不也是知识分子么？他们一个在“满洲国”做“第一号”以上的汉奸，一个住在中华民国捧“满洲国”王的祖先所御用的汉奸“曾文正公”。依曹先生看来，当然是“靠不住”的确证了。但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以寄百里之命”，保幼主中兴，鞠躬尽瘁，岂不是“一点孤忠节烈之气”即“蛮子气”的最高表现么？那么，曹先生认为“靠不住”的，却正是郑“总理”引以自豪的“靠得住”，也就是林“大师”所崇拜的“靠得住”了。彼此所说的靠不靠得住，为什么这样不同呢？我以为该从他们的那知识的本身，尤其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上去找寻答案。同时，那些从来没有好过，也就无所谓特别“变坏”的知识分子，是大可不必放在感慨之列的。

其次，知识分子并不是无论谁都靠不住。现在在群众中活跃着的知识分子姑且不提，历史上从群众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伟大的领袖，知识分子就不少。不过临难苟免卖友求荣之辈，往往被故意地做了夸大的宣传，使有心人像曹先生之流摇头浩叹；至于威武不屈慷慨就义的消息，却又被封锁，压煞，倒无从刺激人的脑筋罢了。

同时，曹先生所说的从“义愤填膺”变成“卖身投靠”，也只算看见了知识分子的一面。另一面，也正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卖身投靠”变成“义愤填膺”。像巴比塞，就是例子。并且在这转变的时代，知识分子只要把握住了正确的知识，从“卖身投靠”到“义愤填膺”的人只有比从“义愤填膺”到“卖身投靠”的人多。当然，要知识分子“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本不容易，今天从“卖身投靠”走了来，难保明天不可从“义愤填膺”走回去。但是只要他不断地在群众队伍中切实地工作，是可以不断地从那铁样坚

强的群众的巨力摄取影响，来逐渐锻炼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游离意识”，是由他的游离生活——对工作，对社会的，实践的游离所养成。

还有，曹先生因为不满意学生代表后来“卖身投靠”，就对五四运动作了过低的估价。这是错的。五四运动的价值应该从那运动本身所包括的社会意义上，从它在历史上演的角色上去估计，不需着眼在几个学生代表的个人行为。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一翼，学生代表又只是参加学生运动的一部分人；学生代表的卖身投靠，如果不是直接出卖运动，给那运动以打击，那运动所能发生的作用不会减少，运动本身的价值是不会减低的。何况曹先生所说的“卖身投靠”，是指以后的事；因为以后“卖身投靠”，就推定他当时就不“纯洁”，理由很欠充分。曹先生似乎很相信黄远生，黄远生因为他自己“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所以也就无认识；他把整个运动的社会作用跟个人行为混为一谈，用以偏概全的办法，对学潮或革命都作了错误的估计，这里无暇申说。但他岂不明明说，“吾于科举时代，绝无作官思想，至为留学生将毕业时，则谋生之念与所谓爱国之念交迫于中”（曹先生原文所引）么？可见一个人纵然后来有了所谓“谋生之念”，但以前的“绝无作官思想”，也可以是千真万确的。当然，我不想为“卖身投靠”的分子辩护，也不想把五四运动的意义故意夸张。如果我们从某一学生代表个人的发展过程上，能够证明他的“卖身投靠”跟五四运动有着多少因果关系，也只能说五四运动本来只是某一阶段的社会运动，到了社会运动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原来参加过那种运动的分子，不能随同社会前进，于是没落；“卖身投靠”不过是没落表现之一种罢了，无伤于他原先的纯洁，更无伤于他参加

过的运动。

末了，曹先生说：“我们自己应该如黄远生那样自己认错，自己暴露自己的恶性梅毒，不要用好听的词语来掩饰！”这话是非常好的。但是只限于作为自我清算，作为一个新方向的开始的场合。如果一面“认错”，一面又悲观，畏缩，自我否定，那又从“恶性梅毒”变成为不可救治的忧郁症，怯弱症了。赤裸地“暴露自己的恶性梅毒”，应该勇敢地就医求治。否则，纵不恨病自杀，也没有什么可贵的地方。并且知识分子既然善“用好听的词语来掩饰”，认错风气一开，安知没有人用“认错”这美名来掩饰自己呢？

总之，知识分子容易动摇是周知的。可是因此认为会宿命地变坏，给以过分的轻蔑，却反使知识分子走投无路，那也大可不必。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的大众，不用说是被全部地夺去了知识。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助力，知识分子如果能把最大的努力献给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是不会小的。当然，天生的十全十美的知识分子也很难想象，往往是对群众贡献了知识，同时也带给了自己的弱点，纵然在热烈的运动之中，也未必不有随时背弃群众或被群众所弃的可能。但是一个知识分子没落下去，更多的知识分子会在群众中成长起来。就没落的个人说，或者有什么悲观之处；整个社会运动却会无视这种悲观，勇敢地迈着巨人的脚步，

## 飞机的用途及其它

【本文是揭露抗战大后方腐败现象的。原为独立的三篇：“兔与狐”作于1940年5月4日，刊于5月16日的桂林《力报·新垦地》上；“飞机的用途”作于5月19日，刊出于21日；“向往”作于5月22日，刊出于5月23日。后合为一篇收录于《历史的奥秘》集中。】

### 一 飞机的用途

报载：“××武库街口××大饭店<sup>①</sup>，有飞机运来地道来路货西餐，每客五十元，小账加一在外。”这是一条非常值得重视的消息。

我常常听见说，××<sup>②</sup>生活程度很高，生存非常困难，所以我虽早想观光，至今尚未成行。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就不相信那些鬼话了。那里生活程度也许很高，但生存一定非常容易。何以见得呢？从有人卖五十块钱一客的西餐看出。有人卖，当然是有人吃；能吃五十块钱一客的西餐，当

---

① 指“重庆武库街口汇利大饭店”，因事涉陪都及“党政军机关人员”，为避新闻检查而加以隐晦。

② 指“重庆”。

然是赚了更多的钱。钱是人赚的，他是人，我也是人，他可以赚，我当然也可以赚。而且从“小账加一在外”一点，尤足证明那里赚钱之易。夫“小账”者，茶房之流所得者也，“加一”者，五块也。茶房之流，伺候一客西餐，即得五块；伺候十客即得五十块，一天伺候十客西餐，何等清闲自在，而五十块国币就进了口袋。茶房犹且日进半百国币，像我这样的人才——比之于茶房，老实不客气地说，我总要算个人才，至少是编报屁股的人才，无论如何，做的事当然要比茶房重要一点，纵然不说收入一定会比他多，和他同等，也就可以了；纵然不同等，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大概也行了吧，那么，生存有何困难呢？

抗战以来，我们无论什么都进步了，这是用不着怀疑的。现在简直连西餐馆都自备飞机（是不是自备待考，纵然不是，其方便也当不下于自备）运西餐了。西餐馆而自备或等于自备飞机，飞机而用之于运送西餐，则飞机之多，不问可知，日本小鬼，就没有听见说有这样阔气。光就这件说，还有什么敌寇是我们打不平的呢？抑又一说，飞机的最正当的用途，应该在于交通运输，只有帝国主义强盗，才用来侵略别人，轰炸被侵略国的设防与不设防的城市。我们的飞机用在运送西餐上，正是使飞机的作用，返朴归真，矫枉而毫不过直。用飞机运送东西，主要的自然是因为迅速，中国这辽阔的土地，有些东西也真非用飞机运送不行。从前杨贵妃在西安要吃广东的荔枝，没有办法，只好难为马腿。荔枝以新鲜者为贵，最好从树上一摘下来就吃。从广东到西安，无论马跑得怎样快，也得好些日子，荔枝的味道，会受影响的，就算影响不大吧，而动念于若干日之前，尝味于若干日之后，在这等待期间，也够馋人的了。如果用飞机运，情形

就会完全不同。杨贵妃不生在有飞机的现在，真是杨贵妃的不幸，她白做了一回贵妃了。

## 二 向往

有五十块钱一客西餐的地方，我真想去。因为西餐既卖到五十块钱一客，当然其味无穷，吃了提神健脑，滋阴补阳，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但那里的报载：那里的卫戍司令部正在“取缔党政军机关人员宴会”，内面有一条：“中餐每人两元以上，西餐两元五以上”，皆在取缔之列。而且不得冒充“常人”，并派有宪兵到各餐馆“检查”。

老实说，我想到那里去吃那样名贵的西餐，本来，就打算先谋一个“党政军机关人员”的位置的。假如我以“常人”的资格出现，就会一文钱的收入也没有，用什么资格吃西餐呢？可是当了“机关人员”，就不能吃那名贵西餐，不但有背初衷，而无缘吃好西餐的“机关人员”，当得也乏味。

忽然想到了一个“二者得兼”的办法；前几天报上说有人主张禁止公务人员兼营商业，足见是有公务人员兼营商业的了。“公务人员”，也就是“党政军机关人员”，我何不在当了机关人员之后，又兼营商业？上办公厅的时候，我是机关人员，下了办公厅，我是商人，商人就是“常人”，马上就可以上西餐馆了。

然而这里已经有人主张禁止了，说不定就要实行；如果那里的情形也一样，又怎么办呢？不必操心，至少暂时还大有可为。我今天看见那里的报纸上有一段“征婚”广告，里面有这样的话语：

某君……任公务员，兼营企业，月入约千元。

足见“兼营企业”，并不被禁止，不但可吃名贵西餐，就是找配偶也非常容易，如果肯花点广告费的话。

### 三 兔与狐

报载：一个“抢匪”为了抢一家书店里的自来水笔——据说并未抢到手，被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并且已经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了。到桂林后，这是第一件使我有点儿感触之类的东西的事情。

孔乙己先生曰：“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参看《鲁迅全集·孔乙己》篇），假如孔乙己先生的理论可以成立，偷书不算偷，是读书人的事；那么，抢自来水笔就也不能算抢，因为应该是作家的事。然而商君有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只问偷不偷，抢不抢，不大肯管犯法的是不是读书人，作家或者别的。孔乙己先生虽然是读书人，大概还不很博，说不定简直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商君其人；否则他的腿子也许不会被打跛了。至于那抢自来水笔的，既明书为“抢匪”，当然不是作家，既然是“抢匪”，即使从来没有抢过，也应该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之后，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我们的孔圣人，就这样诛过少正卯的。

或曰：是抢匪还是作家，不能这样轻易断定；要看所抢的自来水笔是什么牌子。是帕克真空管么，据说现在值得百来块钱，足见他是个用笔的内行，至少差不多是一个作家，

如果只是关勒铭之类，不过值得几块钱，不值一抢；不值一抢而公然抢，足见他有眼无珠，劫掠成性，是抢匪无疑。

幸而文献不足证，不知所抢的自来水笔，究竟是什么牌子。若不幸而证明是帕克真空管，那才真叫人不寒而栗。因为我自己也忝为作家之一——请真正作家们大度一点，让我在这里冒充作家之一吧，而如今生活程度如是之高，文章如是之不值钱，自来水笔又如是之可爱，难保当徘徊于书店文具店的玻璃橱畔的时候，不会心动而手痒。语有之：“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所以我也就有一点点感触什么的了。

## 汽油——艺术

【本文从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现象转而议论到古典哲学和当前的艺术运动，可见作者天马行空的思路和纵横捭阖的文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聂绀弩对张恨水的充分肯定，这在左翼作家中是独具只眼的。原为独立的三篇，依次刊出于1940年5月25、27、28日的桂林《力报·新垦地》。后合为一篇收录于《历史的奥秘》集中。】

### 一 从汽油节约说到张恨水

近来，桂林市上有一种劝谕节约汽油的运动，成绩如何，不得而知。但我却因此想起张恨水君在其近作《八十一梦》的《天堂之游》中有关汽油节约的一段话：

流线型的汽车，如穿梭一般的走着……一辆跟着一辆跑，就像一条长龙在地面上跑。……只见广场中间，树立了一座大铁架。高约十丈。在铁架中间，嵌着铁条支的大字，漆了红漆。那字由上至下，共是八个，乃是“一滴汽油一滴脂膏”。我想究竟神仙比人爽直。这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他们简直说明，血是人民脂膏。

……猪八戒道：你不要信街上贴的那些标语，我坐我自己的车子，烧我自己的汽油，干别人屁事……

如果天上的情形也不过如此，地上的事情，恐怕更难说了。

张恨水君以《春明外史》《啼笑因缘》两书，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书的销路之多，恐怕鲁迅、茅盾、巴金、张资平都比不上，而他的读者也未必是别人争取得了的。但不敬得很，十年以前，我曾一再想读完一册他的书，无奈连两页也看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说些无聊的鬼话似的。

最近，偶然翻翻各地报纸，看见他的《八十一梦》，怀着“看此公现在在写些什么”的心情，看了未完的《天堂之游》，不觉竟为吸引。《八十一梦》，只是一种游戏笔墨，重影射，多谴责，浮光掠影，冷嘲热骂，不脱《官场》《现状》窠臼。虽然比起《啼笑因缘》来，实在少了许多鬼话。

但我觉得与其看清客们写的老板印象记之类的文章，不如看《天堂之游》。不但没有故意作伪的痕迹，有时候还觉得言之有物，痛快淋漓的，比如其中子路骂毛头星孔明一段：

住口！我夫子圣门，中华盛族，人人志士，个个君子，以仁义为性命，视钱财如粪土，万姓景仰。你也敢说圣裔两字？你冒充姓孔，其罪一；直犯诸葛武侯之名，其罪二；在孔氏门徒面前，大言不惭，自称义士，你置我师徒于何地？其罪三。

好久以来，文坛上就嚷着“利用旧形式”，理论家无不